

◎ 总主编 王键

新安医学研究集成

临床研究

*Compendia of Research on Xin'an Medicine
Clinical Research*



主编 杨文明 郑日新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总主编 王 键

新安医学研究集成

临床研究

*Compendia of Research on Xin'an Medicine
Clinical Research*



主 编 杨文明 郑日新
副主编 梁文珍 程晓昱 尚莉丽 于庆生 吴子建
编 委 王 睿 刘春丽 张建华 宋若会 张 琦 葛 岚
杜卫甫 叶铭钢 陈 义 周宿迪 屠彦红 高士秀
张文胜 刘名扬 经文善 陈赛赛 彭 辉 王星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安医学研究集成临床研究 / 王键总主编;杨文明,
郑日新主编.--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337-7519-3

I. ①新… II. ①王…②杨…③郑… III. ①中医
临床-研究 IV. ①R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9145 号

新安医学研究集成临床研究 总主编 王 键 主编 杨文明 郑日新

出版人:丁凌云 选题策划:吴玲 责任编辑:吴玲 王莉娟

责任校对:黄轩 责任印制:梁东兵 封面设计:王国亮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http://www.ahstp.net>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邮编:230071)

电话:(0551)63533330

印 制:合肥华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6341889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9.5

字数:725 千

版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7-7519-3

定价:2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源远流长的新安医学

新安医学发源于新安江流域的古徽州地区，是祖国医学中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综合性学术流派。

说她古老，是因为历史悠久，从宋代形成开始算起，至今也有800余年的历史了；说她现代，是因为命名时间不长，整理研究直到20世纪下半叶方才兴起，不过几十年的光阴。

说她古老，更重要的在于，上下800余年间，涌现出了800多位医家，编撰了800多部医著，学说纷呈、学派林立，创下了许多中医之最，对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做出了举足轻重的历史性贡献；说她现代，更重要的在于，新安医学创新理论与实践早已融入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成为现代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继续为医疗卫生事业、为保障人民健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群星璀璨，医学成就辉煌中华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医学自宋代开始学术争鸣异常活跃，各家学说异彩纷呈，尤其金元时期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医家（史称“金元四大家”）分说立论，形成了寒凉派、攻下派、补脾派、养阴派四大医派。在宋元医学的启发下，新安医学迎来了繁荣发展时期。但明显不同的是，新安医学不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而是群英荟萃的“集团军”；不是一支一脉、



一枝独秀,而是群星璀璨、辉耀中华。

1. 儒医辈出,名不虚传

新安医学以医家众多、医著宏富著称于世。

古徽州一府辖六邑(歙县、绩溪、休宁、婺源、黟县、祁门),山清水秀、古色古香,古往今来文风昌盛,名贤辈出。历史上走出了“齐家治国、兼济天下”的名士群体,“贾而好儒、重义轻利”的徽商群体,更少不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儒医群体。所谓“天下名医出新安”。

据现代研究考证,自宋迄至见于资料记载的新安医家共计800余人,其中明清两代占80%以上。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是人才的“硅谷”,其源远流长的学术团队中,更有一批优秀的领军人物。

如宋代(960—1279)有医术“名满京洛”的张扩,有人称“神医”并在国家医生考试中拔得头筹而入翰林院为医官的御医吴源。

明代(1368—1644)有中医温补学派重要人物、载入《明史》的嘉靖年间全国四大名医之一的汪机,有医术名满北京城的太医徐春甫,有医名隆盛于吴越两地而远近闻达的孙一奎,有医经学派的重要人物、善于针灸和方药并用治病而“百不失一”的吴崐,有伤寒学派的重要人物方有执,有善用温补、时在扬州有“杏林董奉”之喻的程从周,有儒医的典型代表、以医学和儒学研究并举并重而名闻海内的程敬通。

清代(1636—1911)有致力于普及的医学启蒙派代表性人物汪昂,有中医温病学奠基人和温病四大家之首的叶桂,有潜心医学、垂范立法而为医界津梁的程国彭,有清初期三大名医和清代四大名医之一的医书总修官吴谦,有创虚损性疾病辨治新法新说的虚损病大家吴澄,有擅长针药并用治疗喉科危急重症、立新法创新方成功治愈烈性传染病白喉的郑梅涧、郑枢扶父子等。

民国时期(1912—1949)有江南四大名医之一、被誉为“海上名医”的王仲奇,有诗赞其术曰:“入门先减三分病,接坐平添一段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以来,有程门雪、王任之、程道南、王乐甸、吴锦洪、李济仁等一批学验俱丰的新安医家薪火相传。新安医学在地域性医学流派中遥遥领先,独占鳌头。

另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凭过硬的医术治愈皇室国戚、达官显贵而走进太医院的新安太医有63人。太医院是古代专为宫廷官僚服务的最高医疗保健机构,也是全国医政管理机构和医疗的中枢机构,太医首先必须是医术高明的国字号医生。

又据目前统计,从北宋以来,新安名医世家传3代以上至15代乃至25代的有百余家,名医300余人。许多世家传承至今,如始自南宋的“歙县黄氏妇





科”,始自明代的“张一帖”内科,始自清代的“郑氏喉科”“新安王氏医学”“吴山铺程氏伤科”“龙川胡氏医学”“蜀口曹氏外科”“西门桥汪氏儿科”“祁门胡氏骨伤科”等。

清道光二十三年,学者高学文在湖北武昌曾经感叹:“余游江浙闽粤,已二十余年,遂闻天下名医出在新安。”此言不虚也。

2. 医著宏富,资源宝藏

新安儒医重传承、重著述,为我们留下大量医学著作。800多位医家中,有400多位编撰了800多部医籍,可谓著作等身、资源丰富。

新安医籍不仅在数量上卷帙浩繁,更创下了许多医学史之最:

如南宋张杲《医说》(1189)是我国现存最早主要以医案体裁形式记载大量医学史料的医史传记类著作;

明代余傅山、汪宦、吴洋等集会编撰的《论医荟萃》(1543)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医学讲学实录;

江瓘《名医类案》(1549)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和研究历代医案的专著;

吴崐《医方考》(1584)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系统地注解分析方剂的专著,《脉语》作为脉学专著首次论述并规范了医案记录的完整格式和要求;

方有执《伤寒论条辨》(1582)是第一次对中医经典《伤寒论》重新进行编排调整的伤寒著作;

清代汪昂《本草备要》(1683)首创以功效为纲解说药效的编写体例,《医方集解》(1682)是我国第一部以功效为主分类的定型规范的方剂学专著,两书分别是清代以来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普及性本草和方剂著作,版次和发行总量均位居同类书榜首,《汤头歌诀》(1683)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以上三书流传300多年,至今仍是中医重要的入门参考书;

叶桂《温热论》(1766)是中医温病学理论的奠基之作;

郑梅涧《重楼玉钥》(1768)是我国第一部喉科针药治疗专著;

胡澍《素问校义》(1872)是第一部引入训诂校勘的“小学”方法研究《内经》的专著;

汪宏《望诊遵经》(1875)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望诊专著。

近代中医所推崇的“全国十大医学全书”之中,出自新安医家之手的就有三部半:明代江瓘《名医类案》12卷(1549)精选历代名医2405案(与清代魏之琇《续名医类案》一起,作为类书合算一部);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1564)100卷、165门、300余万字,概括了明代以前我国重要医学典籍和医学成就,今列为十大全书之首,它的出版是载入中国医学史的一件大事;清代吴谦《医宗金鉴》(1742)90卷15门约160万字,是一部切合临床实用的大型医

学教科书;清代程文囿《医述》(1826)16卷65万字,述而不作,开系统节录诸家医论之先河。

此外,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1565)是一部富有特色、被李时珍《本草纲目》列入重要参考书目的本草著作;明代孙一奎《赤水玄珠》(1584)30卷76门约140万字,是一部分科齐全、富有创新理念的综合性临床医著;吴崐《素问吴注》是一部研究《黄帝内经》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清代程国彭《医学心悟》(1732)是一部切合实用的综合性临床医著;吴澄《不居集》(康熙、乾隆年间)是一部系统论述虚劳性疾病的专著;《临证指南医案》(1764)是记录一代名医叶桂临床经验的医案专著;《程正通医案》(1883)是一部被江南名医喻为“丰城剑,卞和玉”的医案专著。这些都是在中医药界影响很大、临床上必读必备的古籍参考书,并被中医高等院校编入教材。

800余部著作分属医经、伤寒、综合临床、内外妇儿各科、医案、诊法、针灸、本草、方论、养生、丛书等各医籍门类,涉及面广,理论学术和编撰风格各具特色,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

3. 学说纷呈,花团锦簇

新安儒医创新意识强烈,思维活跃,“于书无不读,读必具特异之见”,“独创之巧”,“推求阐发”,“驳正发明”,“意有独见”,“发群贤未有之论,破千古未决之疑”,敢于突破、大胆创新,在医著编撰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科学价值的学术命题和创新观点。

如明代有:

程玠提出“杂病准《伤寒》治法”说,阐发了《伤寒论》辨证治法的普适性;又提出“心肺当同归一治”说,阐明一张药方可以通治心和肺两脏疾病,颇有先见之明。

汪机以“营卫一气”说阐明人体营卫阴阳相通互涵的辩证关系,以“参芪双补”阐明人参和黄芪既补气又补阴的双重价值,均极具实证性。

陈嘉谟以“治疗用气味”论倡说药物寒热温凉四性和酸苦甘辛咸五味的综合灵活运用,以“制造资水火”论阐明把握炮制程度、发挥药效又不失药性作用,言简意赅。

徐春甫提出“五脏之脾胃病”的新概念和“调理脾胃,以安五脏”的治疗新思路,对增强和调节人体免疫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其“无往不郁”说强调了心理因素在慢性病发病中的重要价值,现代已得到心理神经免疫学的支持。

孙一奎“命门动气”说对生命本原和生长发育演化过程的探索,符合生命科学的复杂性和统一性,与现代基因学理论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极具超前性;与“三焦相火正火说”相结合,揭开了命门学说及三焦辨证指导临床的新篇章。



方有执践行“错简重订”说,重新编排《伤寒论》的篇章条文秩序,既增强了原书的系统性和条理性,又反映了伤寒发生发展、传变转归规律。

罗周彦“元阴元阳说”首次将元气分为元阴、元阳,并强化先后天之分,赋予元气以细胞生命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遗传性、可变性三个特征,提高了元气的临床实用价值。

如清代有:

吴楚提出“脾胃分治”说,强调从胃论治,改变了以往“治脾统治胃”的局面,弥补了中医脾胃学说的不足,拓宽了从脾胃论治的临床思路。

程国彭发明“八字辨证”说,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为辨证总纲来分析归类病情;发明“医门八法”说,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综合归纳治法,构建起了中医辨证治法的新体系和新模式,成为中医临床辨证立法的主要依据。

叶桂创立“卫气营血辨证”说,揭示了温病由表入里的传变途径和规律,标志着中医温病学辨治体系的形成,得到了现代实践的验证和动物实验各项客观指标的印证,与现代西医将疾病过程分为前驱期、明显期、极盛期、衰竭期4个时期也是一致的;其“养胃阴”说以救治疫病、急救胃阴为重心,推衍至内伤杂病养胃阴法,进一步完善了脾胃学说、拓宽了诊疗思路;又提出“久病入络”说,揭示内伤杂病由浅入深而成顽症痼疾的病机,以“虫介药通络”论治,是内伤杂病治法上的一大创新。

吴澄提出“外损致虚说”,认为长期外因损害、疾病缠绵日久可致内伤虚损,极具预见性,现代发现的艾滋病,其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为这一学说做了最好的注解和说明;又有“虚损理脾阴”论,认为虚损脾胃易伤、脾阴易虚,治疗健脾勿忘脾阴,与叶桂“养胃阴”说相辅相成,又为临床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

汪绂提出了用药“补泻相兼”说,阐明了成分复杂的中药“无药不补,无药不泻”、具有补此泻彼的双向调节作用。

郑梅涧、郑枢扶父子以“养阴清肺”说论治肺热阴虚之证,卓有成效地治愈了白喉这一烈性传染病。

余国珮与众不同地提出“燥湿为纲”说,从外感时疫辨燥邪推及内外各科病症辨燥湿,抓住了水是生命之源这一要害所在,确属“医家病家从来未见未闻”之说。

此外,五运六气学说是唐宋时期以天干地支推衍气候周期变化的学说,新安医家从汪机开始,根据事实修正为“运气应常不应变”说,认为一年四时常令可以应验,六十年久远之变难以推演,前者得到了现代医学物候学、时间医学研究的论证,后者得到了天文学“木星超辰现象”的印证,提高了运用



运气学说分析气候、观察病情、合理用药的科学价值。

脉诊是扁鹊发明的中医特色诊法,新安医家从北宋张扩、张挥兄弟开始普遍精于脉诊,徐春甫认为“脉为医之关键”,吴崐指出“一指之下,千万人命脉所关”,中医正是通过把脉来把握阴阳气血盛衰、把握脏腑功能变化、把握“生命指针”的,现代证明脉诊有血流动力学依据,疑难杂病诊治以脉诊为第一依据至关重要。

这些创新见解观点鲜明,立论独特,议论有理有据,涉及生理病理、病因病机、诊断辨证、治法用药、药性药效等各个环节,开拓了学术领域,填补了学术空白,是中医学学术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现早已融入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

4. 发明众多,不胜枚举

新安医家不仅在理论上领先,学说纷呈、学派林立,而且在诊疗技术上达到了当时医学的最高水准,临床上具体的创新发明也不少。

如在传染病的防治上,明清新安医家发明了预防天花的新安种痘法,这是世界上用人工免疫法预防天花造福人类的创举;清代叶桂是第一个认识烂喉痧、发现猩红热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认识,概括了温病发展和传变的途径,现代从SARS、禽流感等疫病由呼吸道传入、传染性极强、传变迅速的病理变化中,进一步得到了印证;清代郑梅涧首次提出了白喉病名,首次发现“假膜”这一病症特征,首次记载了这一烈性传染病的流行,也是成功治愈白喉的第一人,这比西医史上最早的白喉资料早32年。这些都为我国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极为光彩的一笔。

在诊断辨证上,针对晋代王叔和《脉经》寸口脉分候脏腑之说,明代徐春甫作了辨析和修改、清代吴谦作了补充和完善,符合临床实际,现代证明符合生物全息现象;清代叶桂提出温病“必验于舌”,创立了温病舌诊辨证,发明了舌诊燥湿诊法,提出绛舌(邪入营血的标志)和舌苔黏腻(脾瘴湿盛)等新概念,察舌验齿、辨斑疹(热邪深入营血)等法,从此舌诊的作用才得到了真正的发挥。

在临床各科上,元代有李仲南首创“攀门拽伸法”,首次采用过伸牵引复位法治疗压缩性屈曲型脊椎骨折;明代有《古今医统大全》首先记载了以大黄为君下法治耳眩晕、复合磁疗治疗耳聋及挂线治疗肛瘘等方法;清代有郑梅涧创“开风路针”“破皮针”“气针”治疗喉风重症的三针法,吴谦首次详细介绍正骨手法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在方药上,新安医家灵活化裁,创制了许多切实有效的经典名方,流传数百年,历试不爽。如明代汪机创制的玉真散是治疗破伤风的经典名方;吴崐发明的知柏地黄丸现已是治疗阴虚盗汗的常用中成药。清代汪昂首载的



金锁固精丸是治疗梦遗、滑精、早泄的名方；程国彭发明的止嗽散被后代列为治疗外感咳嗽第一名方；清代吴谦发明的五味消毒饮是内服治疗疖、疔、疮、痈的经典方；郑氏喉科创制的养阴清肺汤，与针法、吹喉药灵活施用，挽救了无数白喉患者的生命，这要比1901年首届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Behring发现白喉抗毒素并应用血清治愈白喉早一个世纪。现代临床研究证明，养阴清肺汤合方加减有与特效药白喉抗毒素同等的疗效。

在本草上，明代《本草蒙筌》首次记载了健脾消食的鸡内金、行气止痛的青木香、止血散热的血余炭等药，首次介绍了徽派炮制法和某些药物的特殊贮藏法。

诸如此类的第一、首创在新安医学中不胜枚举。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创新发明被发现、被认识。

名医名著，名说名派，名药名方，博大精深，璀璨夺目。从基础到临床，从经典到教育，在诊疗养生、本草方药、针灸导引、内外妇儿各科等各个领域，新安医学皆有突出的成就和卓越的建树，全方位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充分展示了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故有中医药学“硅谷”之誉，是明清时期中医学的典型代表和缩影。

5. 学术交流，引领时尚

学术的繁荣也是交流碰撞的成果。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月，徽府儒医余傅山邀集各县名医汪宦、吴洋等9人，在徽州府城乌聊山馆集体为门人讲学授课，开展学术讨论，《论医荟萃》就是根据当时讲稿及经验交流记录整理汇编而成，是当时讲学的成果。这是新安医学首次学术交流和讲座的记载。

不仅在新安本地，即使迁居行医他乡的新安医家，在汲取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新安学术基因后，也会积极创造条件，营造一个突出新安学术交流的氛围。

仅仅时隔20多年，寓居京师的徐春甫充分利用自己任太医院医官的机会，于隆庆二年(1568)前，联络和召集全国各地供职京城的46位同仁(其中新安医家21人)，仿孔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例，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一体堂宅仁医会”，以“宅心仁慈”为宗旨，立“医会会款”“会约条款”22项，开展讲学活动、交流学术，钻研医理、切磋技艺。这在中华医学史乃至科技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是我国医学史乃至科技史上的一大创举。会者，合也、聚也，作为最早的全国性医学团体和科技学术团体，宅仁医会的成立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医学需求的必然结果，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医学科技力量的第一次展现和宣示，也是新安医学的第一次对外宣示，是医学之作用、地位的具体体现，具有里程碑的标志性意义。

直到清末光绪十六年(1889)前后,还有业儒通医的俞世球,在南翔(今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任职期间创设“槎溪会课”,师生相与论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学习讨论医学。

“乌聊论医”“宅仁医会”和“槎溪会课”,一在本土,一在京师,一在江南腹地,跨越明清,遥相呼应。新安医学所散发出来的感召力,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风向标。

6. 传播海外,影响深远

新安医学的学术交流和传播,影响无远弗届,对国外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日本医家丹波元胤所著《中国医籍考》中,共收载新安医家63人,医籍139部。尤其是朝鲜、日本两国,不仅通过各种途径吸收了大量的新安医学知识,而且整本翻印刊刻新安医家的许多重要著述,有些版本流传至今,成为研究新安医学及其对外交流的宝贵资料。新安医籍的外传以明清两代为主,这一时期东传的新安医籍不少于30种,主要有:南宋张杲《医说》;明代汪机《石山医案》,江瓘《名医类案》,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孙一奎《赤水玄珠》《孙一奎医案》,吴崐《医方考》;清代汪昂《本草备要》等。明清以来,新安医学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一直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影响十分深远。

儒医辈出、世医不绝,文献宏富、名著林立,创新发明、学说纷呈,交流传播、影响深远,新安医学在地域性医学流派中首屈一指。“繁星九天汇银河”,在祖国医学的星空中,新安医学璀璨夺目、熠熠生辉,是最响亮、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二、器范可风,彰显新安医学特色

新安医学以名医辈出、儒医为主、世医众多、医著宏富、学说纷呈、学派林立闻名天下,这当然也是其特色优势所在。但不仅仅如此,更为关键的是,新安医学特色鲜明,器范可风,体现在多个方面的“统一与结合”。

1. 博古通今与继承创新

首先,新安医家“博古以寓于今,立言以激其后”,博古通今、引故发新,融会贯通、通变创新,理论创新十分活跃,明显地表现出在继承中发展的运动轨迹。

明代程玠“杂病准《伤寒》治法”说是对《伤寒论》辨证方法的推广运用,“心肺同治”说是从《黄帝内经》肝肾同治中触类引申推导提出的;汪机从《黄帝内经》中找到“营气”这个沟通阴阳的切入点,从而发明了“营卫一气”“参芪双补”说;孙一奎在《难经》等著作的启发下,引入宋代易理太极学说而发

明“命门动气”说；至于“运气应常不应变”说，更是对五运六气学说的修正和完善。

清代吴楚“脾胃分治”说是对李东垣脾胃学说的补充和完善；叶桂“养胃阴”说和吴澄“理脾阴”说更是结合李东垣补土说和朱丹溪养阴说而发明的新法；吴澄“外损致虚说”是在李东垣内伤说的启发下提出的；叶桂“卫气营血辨证”说是在《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启迪下，引用《黄帝内经》卫、气、营、血概念而创立的辨证新说，而其“久病入络”说追溯其源也启自《黄帝内经》；郑梅涧是在前人外感温病伏气学说、叶桂温病学说和火燥论的启发下，提出“养阴清肺”新说；余国珮也是吸取先辈温病、伤寒热病中燥气病机的认识，才提出“燥湿为纲”新说。

其次，新安医家在临床实践基础上参古博今，师古而不泥古，具体诊疗运用上多有发明，同样体现了传承中创新的特点。如元代李仲南所创“攀门拽伸法”，是建立在前代牵引复位治疗骨折基础上的；明代程璜、程玠兄弟创立的“以脉统证”诊疗模式，是对脉诊作用的弘扬和发挥；吴崐所创知柏地黄丸，是在宋代名方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用知母、黄柏而成；清代叶桂发明的温病舌诊辨证是前人伤寒舌诊的推衍、深化和发展。

其三，新安医家擅于抓住前人智慧的闪光点，引古人之说加以推衍、引申和发挥，结合实践赋予其新的内涵，在经典注释、启蒙教育和总结归纳中不忘创新。如徐春甫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慎疾慎医”等很多富有价值的养生命题；方有执在重新编排《伤寒论》中，提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三纲鼎立”新说；汪昂在其医药普及著作中，独具慧眼地记述了不少先进的医学理论和创新见解，如“脑主记忆”说、“暑必兼湿”说、“体温而用凉”论、“方剂归经”说；吴谦主修中医教科书，也提出“痹虚”和痹病虚实分类等诸多的新概念和新总结。

新安医家对医药知识的总结归纳，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嘉谟在为童蒙而作中“发明大意”，总结出了“治疗用气味”“制造资水火”论等；程国彭倡导“八纲辨证”，首创“医门八法”及“外科十法”；汪宏发明“相气十法”说，多有新的真知灼见，医理上多有阐发。

新安医家在继承基础上的一系列创用和发明，为中医学的创新和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2. 学术争鸣与融通并蓄

自明代16世纪开始，新安医学学术空气为之一新，学术争鸣异常活跃，但于争鸣中又多呈互相包容的态势。

首先，新安医学虽然理论创新纷呈，但新说本身往往是兼容了前人不同的学术思想和观点而提出来的。如明代汪机将李东垣学说引入朱丹溪学说

中,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而创立“营卫一气”说;孙一奎创“动气命门说”的同时,又相辅发明“三焦相火为元气之别使”的观点,从而与汪机“营卫一气说”联网,形成“原气(命门动气)-宗气-营卫之气”这样一个维系生命动力与能量的链条;王乐甸在“寒温之争”中,吸收融合了新安“温病从属伤寒”“温病不废伤寒”和寒温统一论从而提出“寒温根叶相连”新说。

科学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原来认为正确的可能也有不妥当的地方,原来认为错误的可能有其合理的内核,中医各家学说正是在这种不断吸收、融合、纠偏中不断完善发展的。

其次,新安医学虽然临床风格多样,温补滋阴、伤寒温病学派林立,但各家本身也是通过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兼容并蓄而形成的。现代研究证明,汪机固本培元基本方虽以黄芪、人参、白术补气固本为主,但也往往配有黄芩、麦冬、黄柏等清热养阴药,阴中求阳而兼取朱丹溪养阴法;这种兼顾气血阴阳的固本培元治法,又启发了元阴元阳的划分,为新安养阴清润派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而心法心悟学派既承固本培元之精髓,又传丹溪心法之附余。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通,新安医学家触类旁通、引申发明的功夫,可谓前所未有。

从用药风格上说,除了“平和轻巧”行王道外,还有清代罗浩针对瘟疫重症猖獗之势而提出的“下手宜辣,早攻频攻”的霸道风格。

近代“新安王氏医学”,融经方、时方于一体,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务实,用药轻灵之中有谨慎,平稳之中有灵动,疏密有致,进退从容。

这些本无生命的草木金石,被新安医家活用之后,就如同被赋予了灵动的生命一般,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其三,新安医家多学出多门、转益多师,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为新安医学学术多元融合奠定了基础。像吴洋、徐春甫、孙一奎、吴崐、叶桂、许豫和等很多名家有游历各地、遍访名流、拜师求学的经历,吴洋为探明阴阳之理而跟博士诸生学易经,为探明经络之学而到浙江凌氏处学针灸,听说常山杨氏伤寒造诣深即东游受业于杨,听说祁门汪机医术高明即西往师从于汪;甚如吴崐为学医先后拜师不少于“七十二师”,叶桂10年间“拜十七师”。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每位医家在各自兼容他人之长同时,都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和风格,有时候竟难以界定一位医家究竟属何门何派。

各家各派也互有长短,“任何学者或学派都不可能穷尽真理,更不能垄断真理”。难能可贵的是,新安医家秉持徽学的和谐传统,相互交流融合、求同包容、补充完善、兼收并蓄,几乎集天下中医的精粹而熔铸一体。

伤寒与温病、固本培元与养阴护阴、“四两拨千斤”与“重剂刈病根”,这



一系列对立矛盾的中医核心学术命题,和谐统一地集中于新安医学之中,为现代深入研究中医学重大的实质性学术问题,推进中医的学术进步和临床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不愧有中医学典型代表与缩影的美誉。

3. 家族相授与学术传承

新安医学有源有流、传承有序,尤以世医家族链众多、传代久远著称。新安医学世家每一支每一脉都有其看病的本领,且秘不外传。这种秘不外传的家族传承方式,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封建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有效方式,世医家族链实际上也是一支特殊的学术链,家族传承是外在的形式,学术传承才是本质内容。譬如新安郑氏喉科以“养阴清肺”论治立法、以针药并治和喉科喷药为特色,代代相传,闻名全国;新安王氏医学秉承心法家风,临床以善疏肝理脾、扶阳护阴为主要特色,遣方用药以圆机活法、机动轻灵见长。在接力棒式的传承中,通过一代一代的学术、品行和人气的积累叠加,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优势和声誉,成为群众看病就医的金字招牌。所以,世医家族十分珍视和注重维护自己的声誉,“品牌”概念、“知识产权”意识十分明显。

新安医学家族链与学术链是互相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医术传承是世医之家自觉的行动,是流淌在血脉之中的学术传承,家族传承与学术传承有机统一、有机结合。学术传承是中医学生命力之所在,没有学术上的传承与创新,所谓的家族传承就会成为空壳。

家族传承,由于临床时间早、临证经验多,耳濡目染,一招一式,口传心授,言传身教,毫无保留,潜移默化之中尽得家传秘术,易得病家信任,优势明显。而且代代相传、代代累积,更有利于专科特色的形成,也有利于医术的不断完善和提高。新安各家各派,内外妇儿各科齐全,形成了一个以徽州本土为中心、遍及江南城乡各地、辐射全国的医疗网络,为保障老百姓健康、为中医学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以儒通医与融合道佛

中医是传统文化素养高深、儒家根基深厚的群体,新安医家更是如此。

新安医家医儒不分家,医以儒医为主,或先儒后医、医而好儒,或儒而兼医、亦儒亦医,或仕而兼医、亦仕亦医。据统计由儒、仕而入医者占70%,即使30%继承家传者,受徽州人文思想的熏陶,同样有着好儒而发奋读书的传统。如明末清初程敬通,既是名儒也是名医,“日出治医,日晡治儒;出门治医,入门治儒;下车治医,上车治儒”。他指出:“读书而不能医者有之,决未有不读书而能为医者。”因此新安医家好言“吾儒之学”,将自己定位于儒,以儒为荣,认为医学与儒学互为表里,“大医必本于大儒”,行事“一以儒理为权衡”。

清代程应旸著《伤寒论后条辨》，干脆分礼、乐、射、御、书、数六集。

正是在好儒、通儒的基础上，形成了高水平、高素质、高修养、高密度的新安儒医群体。他们重经典、重传承、重流派，重临床、重积累、重创新，编纂、整理和保留了大量医学文献；他们援儒入医，以儒解医，以治儒之力治医，将儒学的观点、方法、见识、学理融入医学之中；他们秉持宋儒理学“格物致知”的思维传统，实事求是、理性探索，积极探寻和阐发医学新知，努力把握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科学价值的新概念、新学说，对中医学的发展和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安医学以儒学为主，但并不排斥对于佛、道思想的合理吸取。新安山水间佛教寺院及道观众多，佛、道氛围很浓厚，新安医家在与僧道之间交往中，也留下了雪泥鸿爪。

孙一奎十分赞同孙思邈“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的说法，所著《赤水玄珠》就是以道家经典《庄子》所记载“黄帝遗玄珠”的典故来命名的。清代吴澄《不居集》，是根据《易经》“变动不居，周流无虚”之意而命名；郑梅涧《重楼玉钥》之书名，乃源自道家《黄庭经》“咽喉为十二重楼”之语，喻咽喉危急重症犹如重楼之门被锁闭，其书乃治疗咽喉疾病、开启“十二重楼”的玉钥匙。

宋儒以程朱理学为核心，原本就是儒家从佛、道中汲取营养，儒道释三教融合形成的，道家、佛家如影随形。二程、朱熹故里，儒道佛并兴，新安医学以“儒学为魂、道学为体、释学为用”，融儒家的担当、道家的豁达、佛家的慈悲于一体，既突出了程朱理学积极向上、人世致用之精髓，又体现了以儒为主、融合道佛的有机统一与结合，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和渗透性。

5. 地理新安与学术新安

新安医学并非封闭于新安一地，而是根植于本土地理时空而又不断地向外辐射。

由于特殊的山水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新安医家习医行医并非局限于新安一地，多有游历四方、访友交友、拜访名流的经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如明代徐春甫曾游吴越江湘，历濂洛关闽，抵扬徐燕冀，后寓京城；孙一奎认为“宇宙寥阔”，不可以“丘里自隘”，于是自新都游彭蠡，历庐浮沅湘，探冥秦淮，钓奇于越，行医于三吴、宜兴、新都；罗周彦曾南游吴越，北走燕赵，侨居江苏泰州；吴崐由三吴，循江浙，历荆襄，抵燕赵，未及壮年而负笈万里。根据文献记载，新安医家活动范围广，北至辽蓟、南达粤南，“几遍宇内”，其中最活跃的还是江浙地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远升高、登堂入室，既开阔了视野又增长了见识，既引进新思想又传播新安学术。即使在本土，也是身处新安、放眼天下，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与外部世界交流、研讨医道，如汪机与江苏薛己互相尊崇，程敬通曾求教江苏李中梓。新安出版家吴勉学刊刻出版



医书近90种,大多数非新安医著。明清期间新安人刊刻的新安医籍约108种,而非新安医籍则有140多部。

明清时期新安与江浙山水相依、地缘相近,水陆来往便利,同属于江南这个“大家庭”。钱塘江的正源和上游称“徽港”,扬州、苏州等地与徽州更有学术与人文意义上的血脉关系,可以说是“徽州飞地”,也是新安医家的重要舞台和基地,行医乃至客寓者比比皆是。著名的有迁寓扬州的程从周、吴楚、郑素圃、程郊倩,迁徙苏州的叶桂;客寓浙江衢州行医的程芝田还传术于雷氏父子,后雷氏再传术于新安程曦。这是一种血肉相连或骨肉相亲的交流与融合。

学术的交流融合给新安医学带来了新思想、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又促使新安医学连续不断地由周边向中华大地扩散、辐射和延伸。譬如明代徐春甫在京组织成立宅仁医会,清末俞世球在上海南翔创设“槎溪会课”,都是对外学术交流与拓展的标新之举。

明清时期中国的学术重心在江南,以苏、杭、徽三州为学术中心的苏中、浙中、新安三大中医流派呈三足鼎立之势,三地互相交融、融为一体。总结明清时期的核心中医学派如伤寒派、温病派、固本培元派等可见,其发端者或核心代表人物大多为新安人。这些流派的传承发展又是以新安及整个江南地区为大舞台,进而影响着整个中医学术界的。如随着新安医著的大量流传,汪机、孙一奎固本培元思想对浙江赵献可、张景岳,江苏缪希雍、李中梓等著名医家的温补思想,均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又如方有执重订《伤寒论》,后世新安、吴中两地医家积极响应,由江南地区蔓延至全国,从而掀起热火朝天的伤寒学术争鸣态势。反过来江浙医家也促进了新安医学的发展,新安医著更多引用江浙医家之说,张景岳等温补说对后世新安医家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其实就是新安医学学术交流互动的大舞台,一定程度上说,新安曾是主导全国中医学术主潮流的地域。

明清时期新安医学以整个江南地区以及京畿腹地为主要基地发扬光大,近现代转移到以江淮大地和京沪两地为重点舞台,从而在全国各地一定范围形成继承、研究并弘扬新安医学的学术氛围,由点及面逐渐形成了被全国中医药界同仁所认可的大“新安学术”氛围。

“新安”是一个具有历史地理学属性的地域概念,地域概念是静态的,“地理新安”疆域是明确的,不妨称之为小新安;而学术则是动态的,“学术新安”如同新安江水一样是流动的,不妨称之为大新安。随着江水的流动,新安医学在保持地域特色的同时,积极融入和参与整个中医药体系发展的大循环中;反过来说,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早已深深地植入了“新安学术”的基因。大、小新安的互动融合,“地理新安”与“学术新安”的有机统一与结合,构成

了融通流动的新安医学学术体系。

新安医学的根本意义在于区域性医学流派的动态性，在于立足于局部放眼于全局、立足于本土放眼于全国的整体性、综合性。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地方的就越是全国的”，新安医学相对于中医学整体而言，可以说是这句经典最好的例证和注脚。具有时空广泛影响性的新安医学，已经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了精品中医学的代名词。可以说，新安医学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形成的中医学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精品子系统，博大精深的新安医学代表了中医学的最高成就和水平。

6. 医学科学与徽学文化

新安医学姓“医”，名“徽”，字号“新安”。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医学科学体系，也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积累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从皖南古徽州这片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新安医学，不仅是中医学的一个子细胞，也是徽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科学遗产与徽学文化遗产的交汇点。

新安医学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新安医家视野非常开阔，习医不囿于医，不仅博及医源，还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野史杂记中汲取知识、扩充见闻，作为一个群体，哲学历史、天文地理、气象物候、政治军事、数学物理、生物矿物、冶金酿造、社会人类、三教九流，各门类知识无所不通。如经典校注中综合了多学科学问，所撰本草更可以当作百科全书、博物之志来看待，至于理论创见更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诸如“命门动气”“元阴元阳”“根叶相连”等学说，都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没有广博的知识，根本无法承担和完成这样的使命和责任。

文是基础医是楼。古有《脉诀》“词最鄙浅”，为朱熹所不耻。新安医家以医文并茂见长，“辞学宗工”“文章巨子”“以文称雄”“文采飞扬”者大有人在，文笔不好是不屑一顾的。新安医籍往往有着独特的文学色彩，如新安医案医话文辞古雅、行文简练，新安本草讲究声律修辞，《汤头歌诀》更是朗朗上口。

医为百艺之一，本身即富有艺术的品质，不少新安名医精通艺术、爱好书画，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工篆刻善山水者大有人在。譬如“新安王氏医学”世家艺术造诣深厚，擅长笔墨丹青，黄宾虹就曾称赞王仲奇的处方笺“笔墨精良，本身就是书法艺术品”。

国学大师梁漱溟说过：“中医学与艺术具有相差无几的精神。”人文艺术修养对医术境界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作用，体味艺术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中医学的深刻底蕴和内涵。而且，文艺修养能够陶冶情操，也是一个人生活品位和处世方式的具体体现，事关审美情趣和人格尊严，成为涉及“形而上”之人生哲学的大事，新安医家对此就格外偏重。